

孫中山先生逝世百年—— 對「遺囑」去向的思考

石川禎浩

一、前言：孫中山與「大亞洲主義」演講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

去年和今年都是紀念孫中山的重要年度，去年是紀念孫中山1924年11月於神戶進行「大亞洲主義」演講一百週年，而今年3月則是紀念其留下「革命尚未成功」遺言而逝世的一百週年。孫中山在一百年前的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註：應為膽囊癌）於北京去世，享年59歲，以今天的標準而言可謂是英年早逝。在此之前，他從其革命基地廣東至北京，途經日本，在神戶停留約一週時間，成為他生涯中最後一次訪問日本。當此之際，他面對數以千計的神戶市民，進行了被稱為「大亞洲主義」的演講。

孫中山在演講的最後，對實現了近代化並與西方列強比肩而立的日本，在今後的道路問題上進行了發問：「是為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為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人去詳審慎擇！」包括流亡時期，孫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於日本逗留時間前後總計約有9年，與日本（人）淵源頗深，這一發問是他留給日本人的最後訊息。在孫中山去世以後，日本走上了可說是無視此一最後發問的道路，於是，在談論近代日本的道路選擇時，「大亞洲主義」演講至今仍常被引用。儘管演講最後那段「是為西方霸道的鷹犬……」被認為是在演講結束後的第二個月，在中國報紙《民國日報》上刊載全文時所加上的文句¹，即便如此，從孫中山以病體之軀進行演講後旋即離逝的意義上來看，「大亞洲主義」演講與孫中山逝世還是常常被作為相連事件來看待。

關於孫中山與「大亞洲主義」演講，2024年11月末至12月初在日本神戶相繼舉辦了兩場一百週年紀念研討會。其一是由駐大阪中國領事館主辦，以中國外交體系為中心而邀請社會各界所參與的活動；其二是由主要活動於神戶的孫中山紀念會及孫文研究會所主辦的研討會。二者都共同地在回顧「大亞洲主義」演講的基礎上，提出對其當今意義的思考。然而，在孫中山本人的演講經過一個世紀之後，讓人感覺到其中存在著對中日兩國的國際立場和實力關係之見解發生了巨大變化的微妙差異。簡言之，如果說前者是在美國川普（Donald Trump）政權上台後中美關係的緊張形勢下，對日本發出一種「新亞洲主義」的“友好邀請”，即今天日本正應該與中國一同推進新型亞洲發展模式（「亞洲命運共同體」）；而後者則是以歷史研究者為參與主體，更多地提出了在中國成為大國後的今天，將當年孫中山向日本提出的問題反問到對中國未來道路的思考上。

二、「國父」、「總理」與其逝世百年紀念活動

「大亞洲主義」的旗幟如何舉起、又如何放下，如果說2024年是在百年之後試圖對此尋求答案的一年，那麼2025年就應當成為圍繞孫中山本人進行評價和思考的一年。孫中山被尊稱為「國父」，作為革命先驅、領袖以及三民主義的首倡者，長期居於中國近代革命史的中心地位。然而，近年來孫中山這一人物在不斷地被重新評價，其「國父」的價值在這20年間可說是有所遞減。只是其減少的原因與其說在於孫中山本人，不如說是在於其被冠以的頭銜。這如何解釋呢？

孫中山被冠以的尊稱，通常有「國父」或是「總理」，準確地說是中華民國這一「國」的「父」，中國國民黨這一「政黨」的「總理」，即以國民黨所統治的中華民國為前提。把孫中山作為「國父」進行紀念，並將其塑造為理想的領袖形象的並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後繼者們。今天，「民國」和「國民黨」在臺灣的存在感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變得有些微妙，架構在此之上的孫中山之價值也驟然下降。不僅如此，在對繼承「中華民國」的法統、國民黨重新上台等問題上懷有不安及感到困擾的社會風潮中，孫中山不只是毫無價值，甚至可能是負面的遺產。或許在臺灣的孫中山可能會迎來遭受非議的一百週年。

在大陸的情形也與此相應，如果是認可「一個中國」理念並且有過國共合作歷史經驗的國民黨執政臺灣，那麼孫中山作為這一理念的象徵，就如共同財產般具有較高的價值。另一方面，共產黨在堅決希望避免民進黨這一不承認孫中山價值的執政黨上台的考慮上，與國民黨保持著較近的立場。如此這般，在諸多情形及各方的不同考慮中，孫中山一百週年紀念日如期而至。雖說孫中山的「人氣」在減，大陸和臺灣方面仍然舉辦各種紀念活動和企劃展覽。大陸方面，如其故居的廣東中山市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南京中山陵等機構，臺灣方面，當然以臺北的國父紀念館為代表，都有特別展覽、紀念研討會、美術展、紀念植樹等相關活動。

1. 安井三吉、陳德仁合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1924年11月。日本と中国の岐路』法律文化社，1989年。安井三吉「孫文「大アジア主義」講演と神戸」（『孫文研究』第58期，2016年）。

三、有關「國父遺囑」原作的去向

在這些紀念活動與特展的可能展品中，有一件筆者悄然關注的歷史文物，即寫有孫中山遺言「革命尚未成功」的「遺囑」原件。這樣一說，大概會被人質問「在說什麼夢話？當然是要展出的，孫中山逝世一百週年能沒有這件文物？」而我倒要請教說得如此肯定的人，這份「遺囑」的原件究竟要去哪裡才能看到？

眾所周知，孫中山是留有遺書（遺囑）的，即在他去世的前一日所簽署的文書，也被稱為「國事遺囑」或「總理遺囑」、「國父遺囑」等。此文以「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起始，是一篇全文僅143字的簡潔美文。文中回顧了其自身的革命生涯，並向同志表示其信念和目標，尤以「革命尚未成功」一句最為有名。然而，長期以來這份遺囑原作的去向卻不為人知。或許坊間會有種種猜測，如「難道不是保存在臺灣的國父紀念館？」「既然是國民黨最重要的文件，應該收藏在黨史會」，「在故宮博物院？」「民國檔案難道不是在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這樣超一流的文物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吧？」「共產黨不會忽視這樣一件文物，在中央檔案館相關機構吧」等等，然而至少在這半個世紀中，沒有任何人可以確認「國事遺囑」的原件在何處。

那麼，在孫中山傳記或是資料集等出現的遺囑照片又是什麼呢？實際上，現在各種書籍、印刷品、博物館的展板，以及網路信息中所刊載的「國事遺囑」，都是1925年因其發表於報紙的需要而拍攝的照片複製件。也就是說，照片（或者是照片複製品）流傳至今，而由孫中山親筆簽名的重要原版文書卻去向不明。

這不得不說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在孫中山留下的著作中，說「遺囑」是最為有名的文書亦不為過。事實上，「遺囑」並不是孫中山親自寫就，而是由汪精衛等國民黨幹部基於其信念而起草擬就的文書。因此，這篇品格不凡、文辭簡潔的文章並非出自孫中山自身的文筆，其遺書本文亦非其親筆字跡，而只是孫中山在聽取全文後親筆簽名，使其完全具備了遺言的條件。進一步說，「遺囑」之所以變得有名，不僅因其文筆洗練，更因為國民黨在推進孫中山的偶像化過程中最大程度地使用了「遺囑」。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上至中央的政治家、官僚，下至學校的學童，在集會活動時都要朗讀「遺囑」。那些被世人廣泛傳頌的文章被稱作“膾炙人口”，而「遺囑」正是這樣一部透過強制手段讓其膾炙於全國人口中的聖典。而這樣一份無可懷疑的國家一級文物的原件竟然去向不明，倒可說是一樁小小的醜聞。

從遺囑寫就的歷史經緯來看，國共雙方之中按理說應該是在國民黨方面保存，即通常被認為其原件應該是留存於臺灣。臺灣方面的文獻資料和歷史文件在日漸推進數位化，然而卻總是檢索不到「遺囑」的原件。誠然，筆者亦詢問過國民黨黨史會和國父紀念館，其回答都是沒有收藏該原件。為進一步確認訊息的準確性，筆者還請教了在國民黨相關文獻資料機構有過工作經驗的歷史學家們，包括劉維開（現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文隆（現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鍾文博（現國父紀念館研究典藏組研究員），結果卻是持有貴重文物入庫權限的人士都沒有一人見過「遺囑」原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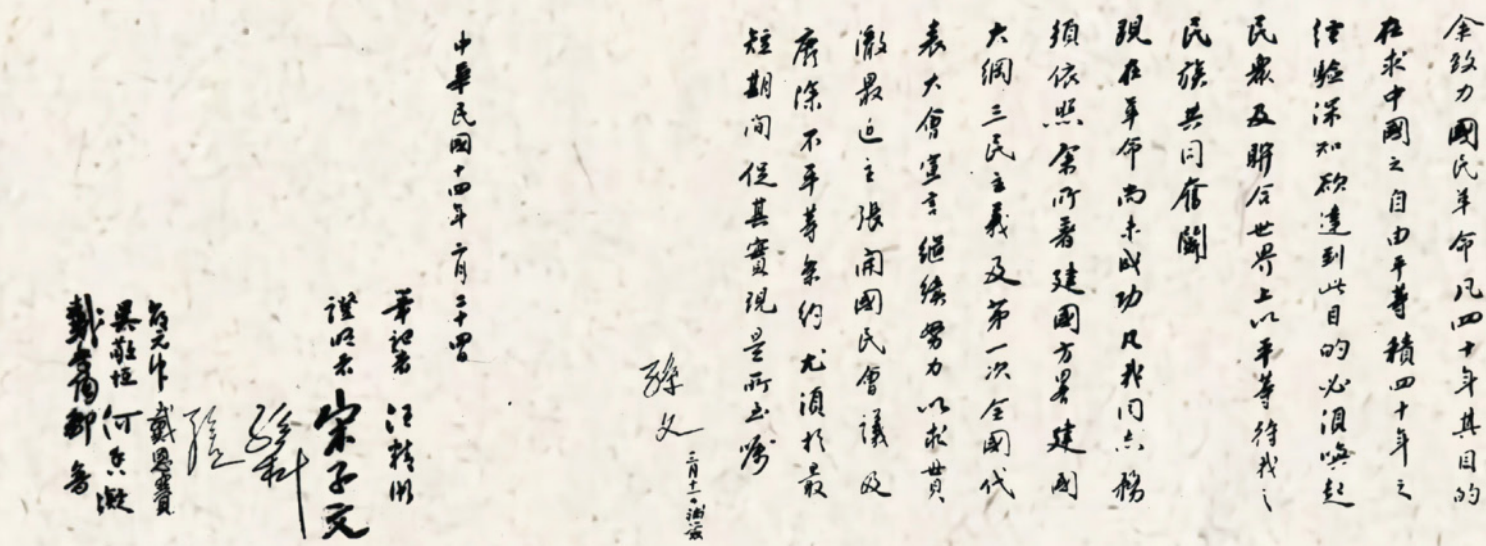
下面再從文獻學的角度來對此進行思考。孫中山的全集以及著作集中當然都收錄有「遺囑」，從最新版的文獻出處來看，大陸出版的《孫文全集》中標註為前述



孫中山先生彌留時



北京鐵獅子胡同內恭置之孫中山先生靈堂



孫中山先生遺囑



1940年4月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

1925年3月14日登載於北京報紙《晨報》的照片。而現行台灣版《國父全集》所收錄「遺囑」之出處則說明為「據黨史會藏原件影本（環 12013）」²，即雖然是黨史館所藏資料，但並非原件，而是照片影印件。此一說明與1973年出版的舊版說明一致，可知在舊版刊行時就已經無法確認原件了。換言之，這份百年前寫就的遺書原件，至少已經失蹤了半個世紀以上。

實際上，孫中山於去世前一日的3月11日在「遺囑」上簽名之後，關於這份「遺囑」的處理與去向有幾種說法。如前所述，「遺囑」在北京的同生照相館拍攝之後，其照片轉載於北京的報紙《晨報》上等。問題出在這之後的事情上。根據身臨孫中山臨終現場的國民黨元勳鄒魯的自傳，拍攝結束之後，「遺囑」的原件由他帶回廣東，交給了黨的相關機構。這一事實由全程經手“遺囑”書寫的汪精衛的言詞可以佐證，即汪在翌年1月召開的黨大會這一公開場合上作了如下說明：「遺囑」原本送回廣州以後，「在一處嚴密謹慎的地方深深藏著。如果各位同志想看看的，可以

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商量，如想攝影，也可以的。」也就是說，在1926年時，「遺囑」保管於廣州的相關機構，線索也到此為止，之後的行蹤就不得而知了。

曾在國民黨黨史會工作的劉維開教授告知有如下說法，即「遺囑」原件在此之後，和同時寫就的給妻子宋慶齡的遺書一同交給了她，並由她保管。在給宋慶齡的遺書中，確實交代了衣物及書籍等個人財產皆留給她，那麼「國事遺囑」也存在被如此處理的可能性。眾所周知，宋慶齡之後留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擔任過國家副主席，如果「遺囑」真由她一直保管，那麼這份文件可能還長眠於上海的宋慶齡故居紀念館，或是北京後海的宋慶齡故居中。在此意義上，「遺囑」原件無論從哪裡被發現都不奇怪，或許在時隔幾十年後的今年重見天日，引發重大話題也未可知。

四、小結

筆者一方面希望「遺囑」原件從一個意外的地方被發現，並且能弄清楚其行蹤的經過，另一方面又覺得即使找不到原件亦無妨。因為，由後繼者們所架構起來的以「遺囑」為首的各種對孫中山進行偶像化的手法，對孫中山（研究）都有著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在孫中山逝世之後隨即而起的大規模個人崇拜，給孫中山帶來了數倍於其生前功績的榮耀，而使得他作為革命聖人被紀念的同時，亦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即不僅無法真正追問孫中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還使得對孫中山和他的後繼者們所從事的「中國革命」這一問題的功過評價被大幅度延遲。

無論是在臺灣還是在大陸，或許可以把孫中山逝世一百週年作為一個契機，嘗試把他回歸到作為一個個人來進行思考，既不是「國父」，也不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由此則「遺囑」的原件並無絕對重要性。「遺囑」原件消失了半個世紀以上，這對於歷史文獻資料的保存來說是一個重大問題，但如果從這件產生領袖崇拜的神器被莫名消失的層面上來考慮，倒不見得完全是一件壞事。

作者：石川禎浩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譯者：漆麟副教授

2. 檔案號「環」是指1914-1925年間，位於上海市環龍路44號的國民黨本部地址。